

G l o b a l i z a t i o n

[美]罗兰·罗伯森 著

全球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丛书主编 苏国勋
杜小真

社

会

梁光严 译

理

论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美)罗伯森著;梁光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社会理论译丛)

书名原文: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ISBN 7-208-03350-1

I. 全… II. ①罗… ②梁… III. 一体化—问题—研究—世界
IV. C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3275 号

责任编辑 屠玮涓

封面装帧 王晓阳

· 社会理论译丛 ·

全 球 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美]罗兰·罗伯森 著

梁光严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75 插页 5 字数 243,000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208-03350-1/C·80

定价 18.00 元

丛书前言

“社会理论译丛”是一套旨在向读者译介国外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理论进展的系列丛书。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一领域重要著述的选译,来丰厚我们的理论积累,从纵深上不断开拓我们的思想视野,增强我们的社会想象力和理论反思能力,以利于各门社会科学的长足进步。

社会理论广义上关系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实质内容上则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而不专属某一学科领域,故,当代许多社会思想家如英国著名社会学家A. 吉登斯等人,从不把自己的研究称作“社会哲学”或“社会学理论”,而是冠名为“社会理论”,其意在于强调,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不可脱离开对构成人类行为之背景的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依赖和制约,换言之,社会结构和文化既为人的行动提供了资源和手段,也是它的条件和限制,二者同样不可须臾或缺。而在我们现行的科学知识体系中,由于历史和现时诸种因素的制约,无论社会哲学抑或社会学理论都是相对发展缓慢,迄今仍属薄弱的环节。这与处在转型中的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大幅加快、社会结构急速变迁的形势很不协调。客观形势要求我们的社会理论要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和较大的变化,才能适应 21 世纪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经济—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国

FQ31 HF06

际环境,解决由此带来的种种冲击和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社会哲学研究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狭窄的概念框架内,这里且不论这种沿袭斯大林式的做法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割裂开来一分为三——作为它的自然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及其在社会领域中的外推和应用即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思维领域中的应用亦即辩证逻辑——在学理上的正当性或合理性问题,仅从实践后果上,这种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归结孤零零的几条原理,成为学生们死记硬背用于应试时的干巴巴教条的做法,就与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与当时社会生活的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完全相背离,其间的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再来看看社会学。众所周知,社会学自70年代末从中国大地上破土复出后,迄今已走过20年的历程。当我们回首这一过程时,可以欣慰地看到,社会学在学科知识普及、专门人才的培养、分支学科的涌现、应用研究的广泛开展以及调查统计分析技术和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50年代以前所无法相比的。但时代毕竟不同了,每个时代都会有其各不相同的任务要解决,不可同日而语。全面地看,社会学在取得可喜成绩的背后确乎也隐藏着某些令人忧心的危机。事实上,社会学从获准恢复研究之日起,就带有它定位上的某种残缺。例如“社会调查的学科化”、“剩余科学”等观点,尽管出于社会学在我国发展中的曲折经历而在复出伊始刻意凸显其经验研究性格,意欲摆脱哲学干预的苦衷是不难理解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显而易见的残缺在日后的发展中一直没能得到根本的弥补。结果就造成应用研究大多未脱离社会调查统计的层次,理论研究却亦步亦趋地甘当这种应用研究的尾巴和附庸。究其根本,最为致命的问题是在社会理论上抱残守阙。社会学如果缺乏了社会理论的想象和反

思,必然沦为对既定现实的无批判的肯定,不仅就像一个先天不足后天缺乏营养的孩子,难以在现代知识分工体系中立定自己的脚跟,而且势必会失却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托克维尔到哈贝马斯、卢曼直至布迪厄和福柯等一代代社会思想大师们所烹调出来的社会学味道。一门学科如果丧失了自己在认识事物和解释事物方面的学科意识,那么无异于自己取消自己存在的理据。

近年来,由于全球化浪潮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也由于实地调查报告式的社会学研究面临的升级困境,忽视社会理论的局面有所改观,但是,如果取而代之的是人人竞相像谈论时髦明星那样把社会理论大师挂在嘴边,或者置于文章注释中作为点缀,那也不过是学术泡沫现象的泛起,恰恰从另一侧面表现出社会想象力的枯竭,与真正的学术建设和品质提升了无干系。

要克服社会学表面繁荣和背后危机四伏的症状,不仅需要首先在与应用研究相对应的理论研究层面下大功夫,而且要在更为广阔而深厚的社会理论上做扎扎实实的基础建设工作,希望这套系列丛书的编辑出版,能为这一建基性工作增添些许砖瓦,作出绵薄的贡献。

苏国勋

于一九九九年岁末

中文版序言

正如我早些时候在本书中曾提到,我最早在 60 年代开始用一种社会学观点就全球形势进行著述。不过,直到 1980 年前后,我才具体运用或者说直接谈论全球化这个主题。本书很大一部分是我在 80 年代就全球化及有关问题所作的许多著述的成果。尽管我的研究方法确实以一种社会学视角为中心,但必须强调,对于所有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我赞同人们通常所说的跨学科研究方法。

自 80 年代初我最早发表有关这个话题的论著时期以来,社会学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激烈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争论的范围在过去二十年左右已经扩大,从而把人类学家、比较文学学者、交往研究专家、政治学家和其他方面人士包括进来。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中,在工商研究(business studies)领域工作的人士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且对于许多政治家、决策者、新闻界人士和了解情况的那些公众来说,全球化如今被——在我看来是不幸地——主要根据来自工商研究视角的许多关于全球化的书籍、文章提倡的术语来理解。

在对全球化的工商研究取向越来越占据霸权地位的过程中,有些经济学家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尽管西方主流专业经济学没有大规模卷入全球化争论。它甚至也没有非常多地卷入全

球经济体成长和扩展这一很突出的主题。然而,尽管在目前争论中还比较缺少专业经济学的参与,但不可否认,全球化讨论在公共领域已经形成了我打算称为经济主义的形态。在使用“经济主义的”这一术语时,我指的是将全球化化约为具体经济因素的强烈倾向。这些因素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减少国家调节和私有化等越来越居于突出地位。总之,我在此指的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毫无疑问,当人们从这个角度看待全球化时,它显然对许多全球性问题负有责任,尽管当然也可以找到理由支持以下主张:从长期来看,全球化从经济意义上说对全球都有益。

本书并不探讨全球化的经济维度。这部分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我最早开始就作为一个具体问题的全球化写作时,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看待作为整体的世界的主导视角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视角。他在分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营造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已在本书一些章节中加以讨论。换言之,我试图在少数于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一直在讨论现代世界形成的社会学家的经济研究方法之外,提出一种文化选择方案。我特别关注文化问题,这不应当被解释为完全信奉文化因素的首要地位,尽管我的确相信:归根到底,文化维度是人类状况的各种维度中最重要维度。而事实上,在目前我正在进行的研究中,我尤其注意全球化的经济方面。

人们将注意到,在本书的某些部分,我引用了若干对东亚的观察结论。我相信中国读者对这些结论将特别感兴趣。不过,我希望我的聚焦点更加宽广,以至于把比如说有关中东、非洲的讨论和更多有关拉丁美洲的讨论也包括在内。一些这样的空白已经和正在在随后的研究中纠正。

关于我近几年的关注点,我在此打算提一下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这个主题——一个在本书中只是稍作处理的问

题。按照大致设想,全球地方化指的是所有全球范围的和产品都必须适当地环境的方式。必须将这种考虑与认为世界文化正在迅速走向同质化的常见观点加以对照。我认为,关于全球文化是正在走向同质化还是以越来越大的多样性和差异为标志这一争论,可能是对作为整体的世界的研究中重要的普遍性问题。

最后,我希望提请人们注意我视之为我的总论点中的一个非常重要方面。西方一些批评者提出了这样一点:我没有给予国家力量和全球不平等问题以足够的注意。我对这种批评的答复是,我正在试图提供一种关于非常长期的全球化历史的形象,它将提到那些如今不属于最强大和最有影响民族国家之列的国度和区域对营造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曾作出的许许多多贡献。换言之,按照全球化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的设想,它在不同时代曾含有许多目前已被边缘化的区域对世界作出的极其重要的贡献。将全球化作为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过程来谈论,是犯严重的历史学错误。

我很高兴中国读者能读到这本书,而且我向翻译此书和所有与出版中文版有关的人士表示感谢。

罗兰·罗伯森

1999年3月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

致 谢

在此,我只能列出少数几位曾经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人士。我向布莱安·图尔纳表示感谢,他广泛的兴趣和论著多年来一直激励着我。对迈克·费瑟斯通,我感谢他对我的鼓励,感谢他对“秩序”、“宗教”这样的概念的怀疑论和他对当代文化的爱好。我非常感谢弗兰克·列希纳,这既由于他80年代初读研究生时对全球化的研究和观察,也由于他较近期对全球化分析的富有见识的贡献。罗纳德·米勒长期对全球化感兴趣,而且他是关于当代世界营造这个问题的认真对话中的一位对话者,为此,我也很感谢他。比尔·加瑞特一直是不断给予我鼓励的源泉,从他本人对人权和宗教理论的研究来看也是如此。约翰·辛普森从最初阶段开始便承认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的全球视角的重大意义,他也一直是考虑周到的评论者。最近,我已开始与汤姆·罗宾斯就全球化诸方面进行合作,我很高兴将此告诉大家。塞奇出版公司的斯蒂芬·巴尔在若干方面也给了巨大帮助。

还有其他一些人曾经鼓励、推动过我,向我提出过异议,特别是匹兹堡大学的研究生小组。乔·罗伊特,一位新近的追随者,也提供了帮助和有益的评论。我希望我在此没有一一提到名字的人给予理解。不过,他们当中一些人在后面的章节中将提到。我于1967年最早作为访问者来到的匹兹堡大学,提供了鼓

励地区研究、比较研究和国际研究的环境。在编成本书的最后阶段里,社会学系的秘书在为我工作时非常努力,我对此表示很感谢。

我最感谢的无疑是我的妻子卡特莲·怀特(Kathleen White)。她本人对国际研究中的计划与管理项目的研究是一个启示之源,因为她对于日常便生活在一个多面性的、政治上会受到指责的全球化世界中,怀有不愿受约束的急切性,并且几乎不停地谈论它。

应当提到的是,以上各位都不对本书中所说的话负责。

以下内容,大部分曾首先提交各种会议并首次发表在其他书籍和期刊中。不过,应当强调的是,这里发表的各章都不是最初的形式。来自以往出版物的那些章节中,每一章都已经作过不同程度的修改,有很多已作了相当多的扩充。

第二章是《文化的社会学意义:一些一般性考察》一文的修改和扩充,该文原载《理论,文化和社会》第5卷第1期(1988年)。

第三章是《为全球状况绘图:作为一个主要概念的全球化》一文的修改和扩充,该文原载《理论,文化和社会》第7卷第2—3期(1990年)。

第四章主要融合了原载《理论,文化和社会》第2卷第3期(1985年)的《现代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文化问题》一文的修改稿与原载汉斯·哈佛坎普、尼尔·J.斯梅尔瑟主编《社会变迁与现代性》(伯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2年)的《全球性,全球文化和世界秩序的形象》一文中一个部分。前者最初是与弗兰克·列希纳合写的,他很友好地同意在这里修改发表。不过,他不是目前版本的一个合作方。

第五章是《全球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关于日本和日本宗教的

说明》一文的修改、扩充,该文原载《社会学分析》第 47 卷(特辑,1987 年)。

第六章是《社会理论、文化相对性和全球性问题》一文的修改、扩充,该文原载安东尼·D. 金主编《文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宾厄姆顿: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1 年)。

第七章是《“文明”与文明化过程:埃利亚斯、全球化和分析上的综合》一文的修改和扩充,该文原载《理论,文化和社会》第 9 卷第 1 期(1992 年)。

第八章是《全球化理论和文明分析》一文编辑过的版本,原载《比较文明评论》第 17 卷秋季号(1987 年)。

第九章是原载《理论,文化和社会》第 9 卷第 2 期(1992 年)题为《全球性与现代性》的一篇书评的修改。

第十章在原载布莱安·S. 图尔纳主编《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伦敦:塞奇出版公司,1990 年)中《乡愁之后:存心怀旧与全球化的阶段》一文的基础上作了很多修改。

目 录

丛书前言	苏国勋
中文版序言	(1)
致 谢	(1)
序 言	(1)
第一章 作为一个问题的全球化	(11)
第二章 向文化转折	(46)
第三章 为全球状况绘图	(71)
第四章 世界体系论、文化和世界秩序的形象	(88)
第五章 日本的全球性和日本宗教	(122)
第六章 普遍主义—特殊主义问题	(139)
第七章 “文明”、文明性和文明化过程	(165)
第八章 全球化理论与文明分析	(185)
第九章 全球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	(198)
第十章 全球化与怀乡范式	(209)
第十一章 从全球视角看“寻求原教旨”	(235)
第十二章 总结性思索	(261)
参考书目	(270)
英汉对照索引	(305)

序 言

我对全球化这个总主题及其意义的研究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在从 1965 年至大约 1972 年这些年里——最初与彼得·尼特尔(Peter Nettl)一起——发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我抓住位于现代化理论与国际关系学科交切面的问题,并特别涉及当时流行的第三世界社会“现代化”问题。在这一项目中,我们的兴趣基本上是“世俗的”。所写成的论文大部分没有提出人们在社会学关于宗教的讨论中看到的那种问题,尽管我简要地考察了实质性的宗教,把它作为被一些作者视为由相对简单的趋同社会构成的世界中的一种断裂(discontinuity)形式。然而,在那些年里,从 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初期,先是在英国随后在美国,我越来越卷入宗教社会学内部的争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至少就所发表的论著而言,我到 70 年代中期已经达到这样一个点,在此,我最明显关注的确实是宗教。但从一开始,我对宗教的兴趣就被用特定取向来标明,这也许说明为什么我对宗教社会学作为一项相对分立的学术事业有很大保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为什么我在该探索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把我引向融合我对宗教的兴趣和我对全球性(globality)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研究。

从一开始,毫无疑问是在我自己对 1880 年至 1920 年这个时期的古典社会学家著作的解读影响下,我就未能把“宗教”话

题看作内在有趣的东西。确实,直到今天,我也没有能够对那些声称他们正在直接研究宗教的人产生——如果说有的话——多大的知识移情作用(empathy)。相反,在我对宗教的研究中,我首先感兴趣的是,它是表达问题、表达现代性产生的问题的场所,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主要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理论家对这些问题很感兴趣;然而,必须强调,在我这里涉及的是 20 世纪与 21 世纪的关系,而不是跨越 19 世纪和 20 世纪界线的时期。长话短说,我对宗教社会学视界之内各种话题和现象的分析,几乎无一例外地探讨宗教与人类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宗教研究与其他学科和子学科聚焦点之间的关系,以及宗教领域变化的基础和衍生结果。与此同时,我倾向于比较性地对待宗教,并且按照社会理论家之间的在一般性争论中提出的思路对待宗教。总的来说,我相信杜尔凯姆关于宗教与“严肃的生活”有关这一主张的含义。

部分地说,以上关于我对宗教的兴趣的描述,说明了为什么我对(最广泛意义上的)宗教的关注和对全球化的关注会汇合到一起。不过,对于这样一种汇合环境和为什么在 1980 年至 1984 年间,我最初关于全球化的明确研究大部分被定位在某种宗教社会学框架之内,我还应当说得更具体一些,同时指出这一框架的不足。关于事实上处在“正规”宗教社会学中心的那个主题,即关于世俗化的争论,尽管我偶尔作过著述,但我对其从未很感兴趣。在相当程度上,社会正在变得更世俗还是变得更不世俗这个问题,在界定宗教社会学这门学科和专业到底涉及些什么时,已经起着关键作用,至少在很有影响的英美圈内是如此。我相对缺乏兴趣的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我倾向于认为,世俗化问题的提出,尽管含有某种对准有关“现实世界”中种种趋势的疑难问题的聚焦点,但也成了定义(宗教)社会学家“既得”利益的一种方

式。与此同时,我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宗教”在多大程度上在 19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头二十五年变成了供人们对民族社会及它们之间关系进行“排序”时采用的一种分类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宗教”曾是而且现在仍然是国际关系的一个方面。

这是我对宗教的兴趣与对全球化的兴趣在相当大程度上曾经汇合的方式的一个例子,但只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事实上是一种更陈旧的兴趣,它起因于 70 年代后期 80 年代初期全球许多地区“原教旨主义”和教会与国家、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合并和紧张关系这二者显而易见的同时性。这一问题群,正像作为一个范畴的宗教到处扩散这个问题一样,看来需要某种明确的全球性聚焦点——一个对准作为整体的世界的聚焦点。而促进这一汇合的另一种考虑,来自于我描述为古典社会学——最突出的是韦伯的论著——中“世界”(world)和“尘世性”(worldliness)概念的双重意义的东西。在本书的正文里,我将有机会考察这一双重意义的重要性。在此,让我简单地陈述一下,从世界是世俗活动的(诸)领域这种意义上,韦伯曾经以某种明确的方式使得世界形象(images of the world)这个概念对其著述(不只是对其“宗教社会学”)来说具有中心意义。与此同时,对于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国际关系或者说“世界政治”,韦伯曾形成相当明确的看法,这些看法最好放在现实主义范畴之中,而且它们构成了一种新达尔文主义的国际关系概念。我关于全球化(以及宗教)的思想,受到这种对韦伯的主导“世界”观——体现在他对宗教的明确研究之中,与他关于“世界”是国际斗争的舞台这种较不明确的观点有关——所作的思考的影响。我的这种思考,与当代关于现代性的问题和后现代性这个概念相关。这种看法,对于布莱安·图尔纳(Turner, forthcoming)在对我的一些研究作出反应时称为具有某种全球性质的救世神学(soteriological)问

题的东西,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在一个迅猛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现在提到作为一种职业或者说天职(calling)的社会学或任何一种其他知识努力时可能指的东西,也有着很大影响。在试图将关于救世神学的争论或者更直接地说将关于职业的争论搬离其韦伯式地基的德国或以德国为基地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当中,有恩斯特·特罗尔奇、卡尔·雅斯贝尔斯、马克斯·舍勒和卡尔·曼海姆。

在我更充分地承认我对宗教的兴趣与我对我已称为全球化的东西的兴趣这两方面的联系时——在更系统地将我关于(从一种“西方”的视角看)生活的“软”方面和“硬”方面的预先假定联系起来时,还有另一种知识上的碰撞曾具有重大意义。这种碰撞,在70年代中期,在对文明比较研究共同感兴趣的背景下,由我一方面与本杰明·尼尔森,另一方面与维陶塔斯·卡沃利斯的会见而引起。这些会见有助于巩固我总的、但未完全形成的“让文明归位”(bringing civilizations back in)的信念。在与尼特爾一起对国际系统和现代化的研究中,我曾经冒险走上这一方向。暴露于对文明及文明之间遭遇——与诸文明之间、诸社会以及诸“亚社会”之间明显“真实的”关系相对的看似平常的事情——的注意细微差别的研究之下,大大有助于深化我对如此丰富多采的全球性的理解。我与“文明主义者”(civilizationists)的碰撞,偶尔也被用来反对我。那些人,或者至少是70年代关注被维陶塔斯·卡沃利斯称为“文明分析”的研究群体中最杰出的成员,已经被“头脑死硬的”社会科学家通过各种方式使之边缘化了,美国的情况尤其如此。例如,尼尔森不时地被描绘为“缺乏系统性”,或者被(以客气形式)描绘为“背离团体、自行其是的人”。不过,在我持续地试图从分析上和解释上理解一般来说也许可以描绘为“全球场”(global field)的东西时,“文明主义者”

(与该群体一个较不主要的成员塔尔科特·帕森斯一道)曾发挥某种重要作用,承认这一点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我本人试图将全球场“秩序化”的尝试,与我提到名字的“文明主义者”(帕森斯除外)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也许,在我的研究中,两个离开“比较文明主义者”的最重要出发点,是我一方面对“主流”社会理论和文化理论作出较高的评价,另一方面,而且在这里甚至更重要,是对现实政治(Realpolitik)作出较高的评价。我对后者的深切关注,需要某种暗示,这不只是因为本书的副标题和内容显示出“一种文化聚焦点”。直到很晚近的时候为止,少数拓荒的社会学家——如雷蒙·阿隆、彼得·海因茨(Peter Heintz)、约汉·加尔东、古斯塔沃·拉各斯和阿米泰·埃兹昂尼——才在 60 年代冒险进入国际关系这个领域本身之中。我在 60 年代中期与尼特尔一起对国际关系和现代化的研究,试图沿着一个更明确的社会学方向,以这些人的研究为基础,并补充和修正这些人的研究。如今,对社会学家本身来说,将“世界政治”作为一个相对自主的行动和互动领域来探讨,有点——但只是有点——比较平常了(而且,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这种对自主性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被那些对性别和国际关系这个问题感兴趣的人“取回”去了)。不过,在目前纷纷尝试“跨学科研究”和人们越来越承认旧学科关于世界的概念具有片面性这种气氛之下,这样的承认越来越有必要。如果要很认真地对待女权主义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批判,就更是如此。从某种自传的意义上说,我本人看待此问题的视角,直到今天无疑还因以下事实而带有某种色彩:我最初严肃的知识选择是围绕我上大学时学社会学还是学国际关系这个问题进行的。某种程度上,像“文化聚焦点”和“文化社会学”这样的说法,反映了在对全球化(更狭窄得多地说,对国际关系)的兴趣与对宗教